



提起韩侍桁，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十分陌生，即使搞新文学研究的人亦对其知之不多。作为翻译家、作家的韩侍桁，不但与鲁迅先生有过一段师生交往、与冯雪峰有近50年的情谊，而且他还有三次山东之行，可惜不见报章披露，今年恰为其逝世30周年，特撰此文。

曾为鲁迅“代购”日文书

韩侍桁（1908—1987）原名云浦，天津人。12岁到南开学校上中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阅读鲁迅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

1924年去日本留学，课余时间翻译作品、写文章，并把作品寄回国。第一篇译作发表在《现代评论》，后陆续有小说发表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1929年回国曾到上海看望鲁迅，在鲁迅、冯雪峰介绍下出席“左联”成立大会。1935年与杜衡等人创办《星火》月刊，1937年任中央通讯社记者，1943年任文风书局总编辑，创办过国际文化服务社，解放后长期任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他精通日语、通晓英语，几十年来翻译了日、俄、英、法、美等国文学著作近40部，如《现代日本小说》《近代日本文艺论》《铁甲列车》等，为我国广大读者介绍了大量优秀读物。

在日本留学期间，韩侍桁先后在《语丝》杂志发表了三篇译文，1928年四五月他意外接到鲁迅来信，“之前虽然对他非常崇敬，读过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旧事重提》，却没有联系过，于是我马上回他一封信”（韩侍桁《我的经历与交往》下简称《经历》），自此以后他们书信来往不断，前后他给鲁迅寄过约50封信，鲁迅给他有30多封信（可惜这些宝贵信笺毁于“九一八”事变后韩侍桁南京家中）。在日本时，韩侍桁曾受鲁迅所托“代购”过不少书，如日文版《堂·吉诃德》《有岛武郎著作集》等，德文版图书《艺术家评传》《古斯塔夫·陀莱》等。1929年4月间韩侍桁给鲁迅写信，说自己准备回国，想托鲁迅找找熟人能否在北平教书。鲁迅十分热心，去北平找了马幼渔等人，《鲁迅日记》对此有记载，后因故未成。

1930年1月韩侍桁去上海投奔鲁迅，并与鲁迅、柔石等一同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鲁迅因参加自由大同盟而遭国民党通缉，韩侍桁还曾专门陪同鲁迅到内山书店二楼避险，其间他与冯雪峰、柔石还常去看望鲁迅并一起出去吃饭。后来鲁迅有意将自己翻译了一半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的《十月》交给韩侍桁接着翻译。韩侍桁拿去看后却觉得鲁迅的译笔没人可替代，自己的“文笔不老练”，就说：“我没有资格照着先生的译文接下去”。韩侍桁后来回忆，这是鲁迅先生“有意培养我，而我不肯接受，他对此当然很不满意”。

后来韩侍桁一起留学日本的同学缪崇群在《文艺月刊》上发表了几段“补白”，讽刺鲁迅是“文坛霸主”，鲁迅怀疑韩侍桁与这些“补白”有关；再后来韩侍桁与杜衡、杨邨人等“第三种人”关系密切，而鲁迅对“第三种人”是深恶痛绝的。

1930年5月魏金枝因柔石被捕的事来找鲁迅，但不知先生居住何处，还是韩侍桁陪同他去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但此时鲁迅与魏金枝谈话，“鲁迅根本不睬我”，仿佛根本不认识站在一边的韩侍桁了，“从此我就不到鲁迅家里去了”。但他晚年深情回忆道：“与鲁迅先生的不欢而散，是我一生中最可悔恨的事……事实上在个人交往中我

没有什么对不起先生的地方。尽管我与鲁迅有过不愉快的一段经历，但我始终把他看作恩师，衷心地感谢他、尊敬他；时至晚年仍常常思念他。”

三次来鲁，曾任教齐鲁大学

其实，韩侍桁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山东找到的——去聊城的省立第三师范教书。这份工作是通过杨晦、陈翔鹤的关系，由宋还吾介绍的。宋还吾原来在曲阜的山东省立二师当校长，因排演新剧《子见南山》闹了一场风波，被撤去校长职务。1930年春，宋还吾由青岛来上海，给韩侍桁带来两条牛舌干，并嘱韩将其中一条转赠鲁迅，韩则直接将两条牛舌干都送给了鲁迅。是年3月4日《鲁迅日记》所记：“下午侍桁赠青岛牛舌干两条”即指此事。

韩是1929年10月初，与在日留学的同学赵广湘一起由济南去聊城的。10月9日《鲁迅日记》记有：“得侍桁信，并稿，济南发”，在聊城省立三师，韩担任高中毕业班两个班的国文老师，其间苦于写文章买不到专用稿纸，给鲁迅信中曾提到此事，还是鲁迅寄来了“原稿纸三百枚”，“鲁迅关心青年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经历》）。惜这次聊城之行只呆了两个月左右，因学生反对教务长闹学潮、罢课，校长让韩劝学生复课，后来学校又怀疑他在偏袒学生，实在呆不下去了，韩便与赵广湘离开聊城，先是坐牛车去禹城，再搭火车返回北平。

韩侍桁的第二次山东之行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九月间我离开南京上战地去了，到山东各地待了一段时间……”此时韩应聘任中央社战地记者，先南京、郑州、武汉、南昌等地，后转至重庆，还经常参加在重庆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担任总干事）的一些活动。但韩这次究竟去了山东哪些地方，待了多长时间，笔者翻阅资料却不得片言记载。

韩侍桁第三次来山东是在解放后的1950年，据其自述：“大约1950年左右，应田仲济之邀往济南齐鲁大学中文系任教，未久即返沪。”当时田仲济担任齐鲁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想来韩、田二人早就相识。

上世纪末，笔者在济南古旧书店“淘书”，于一角落发现两本新文学杂志，一本《现实文学》，一本《星火》二卷四期。那本《星火》至今还有当年旧书店的标价签：5元。这是本大32开的毛边本杂志，按当年三位编辑之一的韩侍桁说法是：“1935年初，杨邨人、杜衡和我，还有一帮年轻的朋友，组织星火文艺社，想办一个刊物，那就是《星火》月刊……由上海杂志社经营，每期印2000份。这月刊大三十二开本，一百多页，很不起眼，社会上影响很小。出至第五期就蚀本……结果第六期出了一大张算是终刊号，就停刊了。”该期首篇文章即韩氏的《文艺的政治性》，署名“侍桁”。这期有缺页，封面左下角亦有部分缺损。82年前的老杂志了，如今翻阅起来不经意间就会往下掉纸屑。

长期以来韩侍桁在山东文坛上极少被人提及、关注。钩沉发掘其在山东的一系列活动轨迹，定能填补济南乃至山东新文学运动史上的一段空白。

煎饼是山东地区传统主食之一，相传发源于泰安，盛行于鲁南、鲁中、鲁西及苏北一带，是久负盛名的山东地方土特食品。

2012年，备受关注的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集《主食的故事》，就有对煎饼制作及其食用方法的简单介绍，使煎饼进入了更多人来山东准备享用的“美食清单”。由于山东地域广阔、物产丰饶，煎饼因地域和制作原料的差别也不尽相同。就地区而言，可分为沂蒙煎饼、临沂煎饼、岚山煎饼、泰山煎饼等；就原料而言，包括小麦煎饼、玉米煎饼、豆面煎饼、高粱面煎饼等，是山东各地人民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曾专门为煎饼作赋，名曰《煎饼赋》，收录于《聊斋文集》中。由于《聊斋文集》一书长期以来只以抄本形式流传，所以传播范围极受限制；加之蒲氏所存遗稿破坏严重、多有亡佚，因此《聊斋文集》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受到较大影响。故而《煎饼赋》一文流传版本颇多。目前所见，以路大荒先生整理的《蒲松龄集》（以下简称“路本”）和盛伟先生整理的《蒲松龄全集》（以下简称“盛本”）中所载《煎饼赋》最为精当，但由于二人版本不同，故路本与盛本也有小异。

结合路本、盛本、《续修四库全书》所收河南省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山东文献集成》所收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和1935年上海九州书局印行王无咎标点本《聊斋文集》，现择其文中精华赏之：“乘兹热铛，一翻手而覆手，作十百于俄顷，圆如望月，大如铜镜，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此煎饼之定制也……三五重叠，炙焯成焦，味松酥而爽口，香四散而远飘。更有层层卷折，断以厨刀，纵横历乱，绝似冷淘……”

《煎饼赋》在内容上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开头到“此煎饼之定制也”为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煎饼的基本制作方法；其后到“胜金帐之饮羊羔”为第二部分，描述了煎饼的食用方法；之后到文末为第三部分，刻画了在灾荒之年中百姓制作、食用煎饼的情况。就文学价值而言，语言生动形象、结构层层递进、逻辑清晰，极具可读性。与此同时，“赋”体物写志的特点在文章第三部分得到了集中体现。

首先，在康熙年间，山东地区遭受到了连续的重大灾荒，粮食歉收，人民生活困苦。因此在序言中作者写到“煎饼之裨于民生非浅鲜也，因为之赋”。这一方面交代了作者写作《煎饼赋》的原因与背景，更折射出作者关心民众生活、重视民间疾苦的悲悯情怀与民生思想。蒲松龄虽才华横溢但一生坎坷，屡试不第，至46岁时方被补为廪膳生，72岁时被补为贡生，以教书和充任知县幕僚为生。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蒲松龄始终保持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信念，关心政治、关怀民瘼，这种精神充分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因此，成于大灾之年的《煎饼赋》一文所传达的核心思想，正是作者对民生的关注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其次，在灾荒接踵而至的恶劣环境下，生存于底层的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中创制出了煎饼新的制作与食用方法，这是古代人民不屈不挠、自力更生的顽强毅力的体现。同时，“采绿叶于椒榆，渍浓液以杂治”虽为灾荒之年的无奈之举，但“带藜烟而携来，色柔华而苍翠”一语却又使之不乏浪漫；“朵双颐，据墙次，咤咤枨枨，鲸吞任意”虽将山村野老的窘困之貌刻画得淋漓尽致，但读之又不失诙谐。这寥寥数语展现出作者对待灾荒时的乐观主义精神。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兼具坚毅品格与乐观精神，正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在困难中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再次，面对锦衣公子“以鼎内之所烹，博尔手中之所遗”的要求，“野老恍然，掉头不易”，这表现出作者对乡野清苦生活的怡然自得，以及对权贵者锦衣玉食的鄙薄不屑，进而突出了作者在困苦生活中面对诱惑仍能保持清冷孤傲、孑然一身的优良品质。蒲松龄一生志在科举入仕，但并不汲汲于官宦，而是对现实政治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他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他要求整肃吏治的愿望，对时政多有批评、讽喻。不食鼎中之食，正是他坚守自己的道德操守和政治理想的真实写照。

作者蒲松龄将民生思想与精神品格融入《煎饼赋》，使这篇四百余字的短文凸显人文关怀和士大夫精神。

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煎饼已经超出了食品的范畴，俨然成为山东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符号。蒲松龄的《煎饼赋》一文不但是古代文学世界中的瑰宝，文中所承载的作者之思想、志趣，更是有鉴于来者，值得后世不断思考。

蒲松龄与《煎饼赋》

张琰

三次来鲁 两次任教
不应当忘记的翻译家韩侍桁

□ 李强